

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的西方因素

郑易平, 聂圣平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人文学院, 南京 210016)

摘要: 苏共执政地位的丧失和苏联的解体标志着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败。这个失败既有深刻的内部因素,又有不能忽视的外部诱因。笔者认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同苏联的长期对抗构成了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的外部因素,具体表现在:西方同苏联的长期对抗动摇了苏联人民的政治信仰,使苏共的合法性受到侵蚀;西方价值观对苏联的领导人、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群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他们逐渐地从思想上背弃了社会主义;西方国家对东欧剧变和苏联民族分离运动的影响,迫使苏共放弃一党制原则;西方国家对苏联激进改革派的支持,使得戈尔巴乔夫受制于激进改革派,间接触发了“8·19政变”;西方对苏联经济援助的不力,使戈尔巴乔夫经济改革计划落空。

关键词: 苏联解体; 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 外部诱因; 西方因素

中图分类号: D5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15(2013)05-0019-07

随着苏联的解体,国内外学术界便将关注的焦点放在了苏联解体的原因、影响及教训等方面^[1-4]。但是对于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研究,学界与之相关的文献却并不多见。在仅有的这些研究戈氏改革的文献中,多数学者倾向于将戈氏改革与苏联解体对接起来进行研究。比如学者马坚就认为恰恰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导致了苏联向资本主义演变,最后竟达到了亡党亡国^[5]。英国学者沃克和俄罗斯政治家雷日科夫更是痛批戈氏改革是苏联解体的罪魁祸首^[6-8]。换言之,学者对戈氏改革的研究依旧围绕着苏联解体这一主题展开。这种研究模式固然没有错,但是它却直接影响了人们对戈氏改革本身研究的重视程度,以致长期以来学界在戈氏改革失败的内外因研究方面的建树非常之少。令人欣慰的是,近年来已有部分学者开始关注戈氏改革失败的原因。如学者罗伊·麦德维杰认为戈氏改革触碰了苏联赖以生存的意识形态根基,“当对这个伟大的意识形态的信任程度减弱之后,那么苏联大厦中的党政骨干结构必然要倒塌”,于是改革失败也就不足为奇了^[9]。国内学者曹

志宏先生与麦德维杰持相似的观点,他也认为戈尔巴乔夫在改革思想上犯了错误,用“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取代列宁主义是其改革最终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10]。学者何萍则从另一个视角进行了考辨,她认为苏联的“政治参与爆炸”是戈氏改革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11]。而国内著名俄罗斯史研究专家陆南泉先生在2008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导致戈氏改革失败的客观因素,主要是在斯大林模式下长期成长起来的在各个领域起作用的阻碍机制^[12]。此外,罗杰·马克威克在评论罗伯特·英格利希的代表作《俄罗斯和西方观念:戈尔巴乔夫、知识分子和冷战的终结》^[13]时曾探讨过戈氏改革及其失败的原因。马克威克指出,虽然英格利希详细地论证了知识分子西化与戈氏改革的关系,但他却忽略了正是知识分子的过分西化才导致了戈氏改革的最终失败,甚至可以说知识分子的过分西化是导致后苏联的俄罗斯的屈辱现状的一个重要原因^[14]。总体而言,以上学者主要侧重于从苏联内部找寻戈氏改革失败的原因。但问题是,外部因素尤其是西方国家的影响也是戈氏改革失败的

收稿日期:2012-11-19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稳定性视角下的美英政治制度运行机理比较研究”(11BZZ01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郑易平(1960—),男,江苏徐州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学院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聂圣平(1986—),男,安徽马鞍山人,法学博士,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学院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讲师。

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特别需要学界关注。

1985年,戈尔巴乔夫开始接手苏联,此时的苏联看起来是与美国并驾齐驱的超级大国,其实已经是千疮百孔、危机四伏了。戈尔巴乔夫一上任就惊呼国内形势已经潜伏着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他指出,苏联正处于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上,“我们没有其他道路”,“改革没有替代选择”^{[15]114}。尽管戈尔巴乔夫改革之初困难重重,但还是受到党内外的广泛支持和期待。可是,没想到戈氏改革的航船在风雨飘摇六年之后就触礁沉没了。戈氏改革的失败,既有深刻的内部因素,又有不能忽视的外部诱因。我们认为,西方同苏联的长期对抗及潜移默化的影响构成了戈氏改革失败的外因。本文将从以下四个方面对这一外因展开分析。

一 西方同苏联的长期对抗动摇了苏联人民的政治信仰

由于在革命战争年代,斗争的紧迫性与残酷性使得党没有来得及对党员和广大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革命胜利后,苏共的意识形态的灌输又充满了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色彩,因此,广大党员和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并不是建立在科学和理性的基础之上,而很大程度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对于未来社会描绘的盲目崇拜基础之上,因此带有很强的非理性特征。这种基础并不牢靠的信仰一旦和现实生活发生矛盾,自然就会坍塌。

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同苏联的长期对抗中,他们确实想通过和平演变战略来达到其“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1947年初,美国驻苏联代办乔治·凯南在给总统杜鲁门的一份报告中写到:“如果作为一种政治工具的党的团结和效能遭到破坏的话,苏俄可能在一夜之间从一个最强的国家,变成一个最弱和最可怜的国家”,因此促进苏联共产党的变化是关键,美国不应坐以待变,而“应极大地加大压力,限制苏联政策的推行,迫使克里姆林宫采取比它近年表现出来的远为克制和谨慎的态度,并通过这种办法促进某种趋势,这种趋势最终必然导致苏维埃政权的瓦解或逐步趋于软化”^{[16]357}。凯南这种通过和平演变来瓦解和软化苏联的思想被杜鲁门所接受,杜鲁门政府制定了冷战蓝图,推行了遏制战略,和平演变就是遏制战略当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艾森豪威尔上台后,推行所谓“解放”政策,即通过一切和平手段来争取东欧国家从苏联共产主义国家统治体系之中解放出来,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和平演变战略。肯尼迪当选后也积极推行和平演变战略,认为美国要通过援助、贸易、旅行、新闻、学生和教师交流以及在“道义上”的支持来争取东欧国家,使美国的自由民主在不发生核战争的条件

下“传染到共产党控制的地区”。后来的领导人约翰逊、尼克松、里根等都继续推行和平演变战略。这种战略确实对苏联领导人及人民的政治信仰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这种影响之所以能起作用,恰恰在于苏联人民的政治信仰基础并不坚实,否则何以解释西方缘何不惧怕苏联对他们进行和平演变呢?

因为和平演变本身是两方面的,西方和苏联双方互相演变。由于苏联是个封闭社会,所有媒体都由官方控制,当局对信息特别是来自国外的信息实行严格的封锁。在和平演变这场战争中,西方和苏联并不对等。从理论上讲,苏联应该处于绝对优势。然而,西方似乎从来都不惧怕苏联对其实行和平演变。可见,苏联领导人及人民的政治信仰之所以动摇,主要是前面所说的基础不牢靠。不仅苏联人民群众,包括领导人如赫鲁晓夫对社会主义的信仰也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一定比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快这个基础上的。赫鲁晓夫之所以推行“三和”政策,就是因为他相信在和平竞赛中社会主义一定能战胜资本主义,他甚至认为竞赛的主要内容是“在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缩短工作日和保障人们的一切福利方面”^{[17]189}。但是没过多久,赫鲁晓夫发现情况根本没有如他想象的那样发展,俄国的工业产品根本无法与西方相比,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得也很慢。特别是到了晚年,他对此更感失望。连领导人都如此,更别说人民群众了。谈到苏联和美国的经济差距时,苏联功勋演员扎斯拉夫斯基说:“最好不要再说我们已经赶上了美国。讨厌再听到我们整天高声说,我们,我们,这一切都是无止境的吹牛。”教师别莉洛夫斯卡娅也说:“不知道怎么对我教课的班讲。在与听者交谈时,我总是依据我们美妙的大纲,说劳动人民的物质状况在不断改善。现在我该说什么?我不再相信了。”^{[18]156-157}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长期落后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不可能不使苏联人民政治信仰的基础坍塌。正如邓小平所说:“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工资增长被通货膨胀抵消,生活水平下降,长期过紧日子。”^{[19]370}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除了苏联经济体制本身的问题外,还因为美苏长期对抗导致苏联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畸形发展,而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轻工业和农业长期落后,尤其是军备竞赛耗费了苏联大量资源,因此在资源分配过程中,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求只好放到次要的位置,按照“剩多少算多少”的原则来安排。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人民的信仰危机更加严重,用索布恰克的话说:“仍被共产主义幻想俘虏的人,

只有百分之几了。共产主义在俄罗斯的命运已经注定了，共产主义教条已在人民心目中丧失了吸引力。”^[20]他的话可能危言耸听。但有资料显示：1990年，有32%的人主张模仿美国模式，32%的人主张模仿日本模式，17%的人主张模仿德国模式，11%的人主张模仿瑞典模式^{[21]796}。

可见，西方和苏联的长期对抗和苏联本身的过度反应，导致人民生活水平长期落后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最终使人民在失望当中动摇了自己的政治信仰。

二 西方价值观对苏联的领导人、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影响

正是因为在与西方的长期对抗中，苏联人民的政治信仰出现动摇，西方价值观趁虚而入，对苏联的领导人、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群众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被称为改革设计师的雅科夫列夫、叶利钦和索布恰克等激进改革派的代表人物几乎全面接受了自由、民主、人权等西方价值观自不待说，戈尔巴乔夫本人也受到了西方价值观的深刻影响。当然，戈氏主要受到西方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戈氏一上台，就和许多社会民主党建立联系，后来相互来往越来越密切，戈氏的思想越来越倾向于社会民主主义。他曾公开承认他吸收了勃兰特等众多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党国际所创造的许多东西。有意思的是，资深社会民主党领袖勃兰特也坦言戈尔巴乔夫确实受到他和其他社会民主党人的影响。

美苏的长期对抗使苏联的军费负担越来越重，经济发展难以为继，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不得不迅速而全面地调整对外政策，根本改变与美国对抗的国策。在1987年，即戈尔巴乔夫上台的第二年就出版了《改革与新思维》，为调整对外政策做理论上的论证，此书的社会民主主义色彩随处可见。戈尔巴乔夫在书中已不再认为美国是“万恶帝国”，相反，提出了“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全人类的价值至高无上”等著名论点，这实质上是对由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创造的人类文明成果的认可，也暗藏着对苏联传统意识形态的厌恶和过去脱离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道路的悔恨，以及对重返人类文明的主流——欧洲文明的向往^[22]。戈尔巴乔夫后来曾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有着就其内容来说十分相似的进程”^[23]。1990年，苏共中央二月全会正式肯定了“三权分立”学说：“三权——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分立对于管理效率来说有关键性意义”^{[24]224—225}。下台后，戈尔巴乔夫直言不讳地说：“我生活的目的就是消灭对人民实行无法忍受的独裁统治的共产主义。……我只有身居最高层职位，才能对此有最大的作为。因此，我妻子要我不懈努力地往上爬。当我亲自认识了西

方，我的决定就成了不可更改的了。我必须消除苏共和苏联的整个领导，我必须消除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我的理想是走社会民主党的道路。”^[22]戈尔巴乔夫是党内主流派的首领，他的思想实际上也是主流派的思想。

除了领导人外，苏联知识分子也受到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价值观的强烈影响。最能说明这个问题的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苏联持不同政见运动的同情、影响和支持。苏联持不同政见运动是从勃列日涅夫上台时开始的，其成员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自由主义派是该项运动中影响最大的派别。这一派别在政治思想上崇尚欧美社会的自由、民主价值观，它的代表萨哈罗夫进入70年代后逐渐成为一位美国式的自由民主的提倡者和鼓吹者。持不同政见运动虽然遭到了苏联当局的严厉镇压，但它对苏联政治体制的崩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首先，传播他们思想的地下出版物在群众中广泛流传，不仅知识分子就连普通工人阅读地下刊物也成了一种时尚，相当多的工人对持不同政见者抱同情态度，尽量保护他们的活动。其次，也是最重要的，他们的思想直接影响了在赫鲁晓夫时期成长起来的被称为“60年代人”，这些人中的很多人也包括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等后来都成为改革的中坚。持不同政见者的许多思想和主张直接成为后来戈尔巴乔夫、特别是叶利钦改革的主导思想。叶利钦成为党内激进派的首领时，萨哈罗夫就成为他的亲密战友，他俩经常并肩“战斗”，直到萨哈罗夫去世。从这个意义上说，索尔仁尼琴确实是一语成谶：持不同政见运动是“俄罗斯知识分子为反对苏联政权所做的精神和意识形态上的准备”^{[25]533}。

持不同政见者不仅为苏联政治体制的改革及崩塌作了思想上的准备，而且在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政治上相当活跃，不仅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小说和论著，揭露苏联的弊端，而且组织各种团体，积极进行游行示威和竞选等各种政治活动，成为改革的急先锋。譬如，萨哈罗夫1989年6月9日在第一次人民代表会议上发言，第一条建议就是取消规定共产党领导的宪法第六条，难怪有人说他临死前“给了这个制度致命的一击”^{[25]533}。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一开始就同情并采取各种方式支持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运动。1970年，著名持不同政见者索尔仁尼琴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1975年8月，美国、苏联等35国在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上签署了《赫尔辛基协定》，文件写上了保卫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的内容，规定所有的签字国都有义务允许东西方国家之间的人民、思想与商业更自由的交换与往来。此后，欧美国家公开支持持不同政见运动。1975年，萨哈罗夫获得

诺贝尔和平奖,就是对持不同政见运动的一大鼓舞。1977年,苏联当局对莫斯科和基辅的赫尔辛基小组领导人奥尔洛夫和鲁坚科的逮捕引发了世界性的抗议斗争。同年,卡特总统一上台就接见索尔仁尼琴和刚获准赴美的一名苏联持不同政见者领导人B·布科夫斯基,并致函萨哈罗夫,声称苏联的人权问题是美国政府主要关心的问题。在西方的支持和资助下,一些流亡在国外的持不同政见者发表自己的著述,出版《来自苏联的信息》杂志并向国内传播。西方媒体开始系统地报道苏联持不同政见者活动的情况,为运动加油助威。1988年5月底,来苏联访问的美国总统里根公开接见了持不同政见者,再一次使他们大受鼓舞。

除了持不同政见者外,其他知识分子也受到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价值观的影响,特别是中青年知识分子,例如著名的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盖达尔、丘拜斯等。盖达尔成长在一个典型的革命家庭,他的祖父是红军指挥员和苏联儿童文学的经典作家,父亲是著名的海军将领和苏联驻古巴军事代表团团长。在莫斯科大学上学时,盖达尔获得了列宁奖学金,加入了苏联共产党,博士毕业后,被任命为苏联党中央最重要的理论刊物《共产党员》杂志经济政策部主任。但盖达尔阅读了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并深受后者的影响,到20世纪80年代,他主持了成员大多来自中央经济数学研究所的地下经济学研究小组,思想上发生了更大变化,被称为“芝加哥小男孩”、“完全美国化了的专家”。丘拜斯毕业于列宁格勒工程经济学院,做过副教授,无独有偶,他主持了圣彼得堡地下经济学研究小组,他受西方经济学的思想影响比盖达尔有过之而无不及。

早在1981年,戈尔巴乔夫刚进中央书记处时身边就聚集了一大批经济学家和学者,当时几乎苏联所有的经济学研究所所长、院士、大学知名学者都定期和戈尔巴乔夫聚会,以至于这里几乎成了一所独特的学校,戈尔巴乔夫在这里了解情况并接受培训。他上台后,将知识分子作为自己倚重的力量,对他们委以重任以推动改革。除亚历山大·雅克列夫之外,瓦·安·梅德维杰夫、阿巴尔金、阿·格·阿甘别吉扬、安·伊·安奇什金、斯·阿·西塔良、斯·谢·沙塔林、格·阿·阿尔巴托夫等著名学者组成了戈尔巴乔夫的智囊团,他们不仅准备讲话稿,还参加重要文件的拟定和重要方案的制定。

前面分析过美苏对抗动摇了人民的政治信仰,随着民主化和公开性的推行,知识分子通过文章、演说、电影、戏剧等多种形式把他们的思想传播给人民群众,结

果人民群众的思想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对苏共传统意识形态的动摇发展到对它的背弃。1989年夏秋季爆发的支持激进派的煤矿工人政治大罢工就是一个明显标志。据社会学调查资料显示,到1990年,主张走西方道路的人占总人数的90%以上^{[21]796}。由此可见,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价值观对苏联人民影响之大。

三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东欧剧变和苏联民族分离运动的影响

1980年9月22日,波兰成立了旨在改变现行政权的团结工会,经过多年的斗争,它终于在1989年的议会选举中获得胜利并组织了波兰战后第一个非共产党联合政府,而完全失去政权的波兰统一工人党则于1990年1月解散。1989年的波兰剧变宣告了战后波兰45年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败。1985年,匈牙利的政局开始动荡,大批知识分子陆续流亡西方,出现了反对政府的地下刊物。从1988年开始,以民主论坛为首的反对派积极从事改变匈牙利政治体制的活动,同时匈牙利共产党(社会主义工人党)内的“改革派”也逐渐得势,1989年10月初,社工党改名为社会党。在1990年的选举中,民主论坛获胜,匈牙利“和平”地实现了政权更迭。在波兰、匈牙利变动的冲击下,捷克斯洛伐克的党和政府受到了巨大的压力。1989年6月,捷克“七七宪章”提出彻底改革和推进民主化的要求,11月17日,首都布拉格发生群众大规模游行示威,11月19日,“七七宪章”等12个反对派组织联合成立“公民论坛”。接着,捷克共产党发生分裂,党内出现“民主论坛”,支持反对派的政治主张。在12月28日至29日的联邦议会选举中,捷克反对派获胜,捷克共产党丢失政权。1989年,民主德国开始有大批居民出走,政局开始不稳定,10月,国内不断发生示威游行、冲突加剧,民主德国社会民主党、新论坛等反对组织也相继成立,在内外压力下,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一步步退让,最终在1990年的人民议院选举中失败,由执政党沦为在野党,10月,以民主德国加入联邦德国的形式实现了两德的统一。随着波兰、匈牙利、捷克、民主德国共产党政权的崩塌,其他东欧国家像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等社会主义国家也相继发生了剧变。

东欧剧变虽然是内部矛盾发展的结果,但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反对派的支持也是剧变发生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外部原因。东欧国家的反对派无一例外都得到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支持。从波兰的团结工会,到民主德国的新论坛、捷克斯洛伐克的公民论坛以及保加利亚的生态公开性组织等反对派组织,他们的主张在西方得到宣传并传播到他们本国,他们的行动一

直得到西方的鼓励与支持,他们的活动经费也绝大部分来自西方国家。最有代表性的是波兰的团结工会,从成立伊始就得到美国政府的大力支持,1981年12月,团结工会遭到当局镇压,里根政府用尽一切办法对其进行挽救,到1988年团结工会终于东山再起,并最终夺取了政权。

东欧剧变对苏联民族分离主义势力是一个极大的鼓舞。他们自然会想到:既然东欧国家可以脱离苏联控制而实现真正的独立自主,我们同样可以成功。早在1988年10月,波罗的海三国的民族主义势力相继成立了人民阵线(在立陶宛为“立陶宛争取改革运动”),开始了争取独立的活动,他们的行动受到了三国党的领导人的支持和利用。1989年,立陶宛和爱沙尼亚最高苏维埃通过致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和苏维埃政府的呼吁书,要求宣布1939年苏德条约非法、无效,事实上公开提出了脱离苏联而独立的要求。在东欧剧变的鼓舞下,立陶宛于1990年3月11日宣布独立。美国总统布什随即表示支持,而国会的态度更为坚决,参众两院立即敦促布什政府考虑承认立陶宛,尽早同它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把批准美苏贸易协定同苏联是否与立陶宛政府进行有诚意的谈判和放弃其经济制裁相挂钩。1991年1月13日,苏联坦克进入立陶宛后,美国各界反应更为强烈,参众两院认为苏联继续在立陶宛使用武力必将严重影响美苏关系的前景,参议院要求美国政府重申和减少对苏联的经济和其他援助,众议院则要求布什政府同西欧盟国加以协调以对苏进行制裁,结果在很短时间内,美国就向波罗的海三国派驻了外交官。布什警告苏联在立陶宛使用武力可能对美苏关系产生“不利影响”,在接见美籍波罗的海人社区领导人时,布什表示赞成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变为“芬兰式的独立国家”。在5月2日的一次讲话中,布什坚决主张“支持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的自决”。可见,苏联的民族分离运动,不仅受到东欧剧变的鼓舞,而且直接得到了美国的有力支持。

民族分离运动的发展,使苏联的局势变得更加紧迫和复杂。比如立陶宛的共产党因害怕被本国人民抛弃而不得不支持独立,他们的立场实际已经破坏了苏共的统一。随后,立陶宛共产党分裂为维护苏共组织统一和要求从苏共中独立出来的两派,从而开始了苏共从高度统一的体制向“联邦化”转变的过程。不仅如此,苏联的一党制向多党制转变,也是首先从立陶宛开始的。1989年12月7日,立陶宛最高苏维埃修改了该共和国宪法第六条(该条规定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宣布实行多党制。1990年2月,苏共中央全会才决定放弃一党制原

则。所有这些都给戈尔巴乔夫所推动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带来了更大的困难,并最终成为其改革失败的导火索。

四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苏联激进改革派的支持和经济援助的不力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所推动的东欧剧变,不仅影响苏联的民族分离运动,而且给激进改革派以极大的鼓舞,增加了他们获胜的信心,对已经出现危机的苏联政局产生了强烈的冲击波。这个冲击波用叶利钦的话说就是:“砸在柏林墙上的第一锤宣告了苏联的终结。”

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激进派改革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有着根本的区别。“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基本内容包括:指导思想上搞多元化、政治上搞多党制和议会政治、经济上搞私有化和军队建设上搞非党化等,从其内容可以看出,戈氏改革在多数方面背离了传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但吊诡的是戈尔巴乔夫并没有打算与社会主义完全决裂,相反他一再声明自己改革的最终目的是实行一种全新的社会主义体制——人道(民主)社会主义。而激进派的改革是公开与苏共彻底决裂,抛弃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政治上转向反共、反社会主义立场,思想上宣誓忠于西方教科书上的“纯自由主义和纯资本主义”。

苏联的激进改革派类似于东欧的反对派,他们同样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同情、鼓励与支持。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闹翻并被免去党内高级职务后想去美国访问,美国大使当即答应考虑。在当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院代表后,叶利钦作为反对派的代表果真收到美国政府的访问邀请,并受到美国总统接见。1991年6月份,叶利钦在刚当选俄罗斯总统而尚未就职的情况下就接到美国总统的访问邀请。另一位激进改革派首领莫斯科市市长波波夫在得到政变的可靠情报后难以直接告诉叶利钦,而是首先告诉美国大使,让他设法通过美国总统布什转告,由此可见,他们互相之间的信任已经达到了何种程度^{[26]761}。对于“8·19”事件,布什经过短暂的“暧昧”后发表声明对政变表示谴责,认为政变是非法和违宪的,并立即和叶利钦取得了紧密联系,仅在政变的第二天,布什就和叶利钦通了三次电话。叶利钦向布什介绍了国内局势和进一步的行动方针,布什则向叶利钦保证美国支持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此外,布什不惜违法瞒过国会把通过破译密码获得的政变领导人的谈话情况告诉叶利钦,这等于帮了叶利钦一个大忙,叶利钦掌握这一关键情报即掌握了军事将领的态度,这样就可以去做争取和分化的工作。不仅如此,布什还派了一位通信专家去帮助叶利钦争取态度摇摆不定的军事将领的支持。

正是因为西方大力支持,以叶利钦为首的激进改革派信心大增,实力猛涨,这反过来又制约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一旦戈尔巴乔夫向传统派靠拢,比如在波罗的海三国独立的问题上采取强硬措施,美国就表示难以容忍,并给戈尔巴乔夫施加压力。这就打破了主流派、传统派、激进改革派三者之间的平衡状态,使天平向激进改革派一方倾斜,迫使戈尔巴乔夫向叶利钦靠拢,准备签署规定各加盟共和国为“主权国家”的新联盟条约。在苏共传统派看来,新联盟条约的签署必将使联盟形同虚设,国家和党不可避免地会四分五裂,他们自身的地位也会一落千丈。为了挽狂澜于既倒,他们决定铤而走险,于新联盟条约签署的前一天,即8月19日发动了震惊世界的“8·19政变”。政变的失败使签署新联盟条约的计划落空,国内局势急剧变化,联盟中央的权威丧失殆尽,不仅直接导致苏联的解体,而且使苏联共产党土崩瓦解。可见,西方对激进改革派的支持,间接触发了“8·19政变”,并最终导致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败。

虽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表示了肯定和鼓励,但是对其的支持主要表现在政治上,在经济上则是“口惠而实不至”。虽说在政治上总体是支持戈尔巴乔夫的,但这种支持是有条件和有限度的,就是说改革必须按照西方所认可的方向发展,否则就加以打压。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戈尔巴乔夫改革在经济上的“口惠”实际造成了一种误导,他们一再表示会全力支持 and 配合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改革,使得戈尔巴乔夫误认为他的改革会得到巨额资金,但到关键时刻,他们却迟迟不予兑现。例如1991年5月,戈尔巴乔夫的经济顾问亚夫林斯基与哈佛美国学者共同起草了旨在指导苏联改革的“哈佛计划”,戈尔巴乔夫打算用苏联“朝着民主化方向前进”、“实现市场经济”和“建立新的世界安

全秩序”为条件来换取1500亿美元的西方外援(“哈佛计划”提出),但他颇具雄心的计划并未得到西方的同情与响应。因为在苏联前途未卜、去向不明时,西方国家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不愿随便出手援助。事实上,面对戈尔巴乔夫急需外援的强烈要求,西方国家并未给出多少经济援助。据有关资料统计,1990年9月至1992年1月,西方国家给苏联提供了800亿美元的援助,而美国作为戈尔巴乔夫寄予希望最多的国家仅援助了46亿美元,约占西方总援助金额的6.5%^[27]¹⁴¹⁵。美国在经济援助上的一再“吝啬”,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个不小的打击,降低了其改革成功的可能性。

戈尔巴乔夫改革距今已有20余年,但其给俄罗斯政治经济带来的阵痛以及对共产主义事业产生的损伤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完全抚平。如今回顾并反思戈氏改革失败的原因和教训,依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正如列宁所说,堡垒总是从内部攻破的。戈氏改革失败主要还是因为其内部出现了问题。但是外因也是导致戈氏改革失败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或者说它加速了戈氏改革失败的进程。西方同苏联的长期对抗及潜移默化影响构成了戈氏改革失败的主要外因。在同西方长期对抗中,苏联人民的政治信仰逐渐出现动摇,于是西方价值观趁虚而入,对苏联的领导人、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群众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在此种境遇下展开的戈氏改革已很难获得坚实的阶级基础。无独有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此时的火上浇油举动让本已举步维艰的戈氏改革更加雪上加霜,这些举动包括积极推动东欧剧变和苏联民族分离运动、积极支持苏联激进改革派、轻视对苏联改革的经济援助等。

参考文献:

- [1](俄)尼古拉·雷日科夫. 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M]. 徐昌翰译.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8.
- [2]钟亚萍. 俄罗斯部分人士对苏联解体的反思[J]. 马克思主义研究,1997,(5).
- [3]刘玉芬. 苏联解体的历史原因[J]. 理论视野,1999,(5).
- [4]周新城,等. 苏联东欧国家的演变及其历史教训[M].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0.
- [5]马坚. 改革必须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巩固与发展——苏联演变及其教训的思考之三[J]. 真理的追求,1996,(7).
- [6](英)雷切尔·沃克. 震撼世界的六年——戈尔巴乔夫改革怎样葬送了苏联[M]. 张金鉴译. 北京:改革出版社,1999.
- [7](俄)尼古拉·雷日科夫. 背叛的历史——苏联改革秘录[M]. 高洪山等译.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
- [8](俄)尼古拉·雷日科夫. 大动荡的十年[M]. 王攀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
- [9](俄)罗伊·麦德维杰夫. 苏联的最后一年[M]. 王晓玉,姚强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 [10]曹志宏. 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原因探析[J]. 西伯利亚研究,2005,(6).
- [11]何萍. 戈尔巴乔夫改革中的“政治参与爆炸”[J]. 福建论坛(社科教育版),2010,(6).
- [12]陆南泉. 戈尔巴乔夫经济体制改革失败与苏联剧变[J].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8,(1).
- [13]Robert D. English. *Russia and the Idea of the West: Gorbachev, Intellectual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0.

- [14] 罗杰·D·马克威克. 知识分子的西方化与戈尔巴乔夫改革[J]. 欧亚研究(荷兰), 2000, (6).
- [15] 齐向, 等. 苏联解体内幕[M].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2.
- [16] 曹长盛, 等. 苏联演变进程中的意识形态研究[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 [17] 桂立. 苏美关系 70 年[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5.
- [18] 左凤荣. 致命的错误[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1.
- [19] 邓小平文选: 第三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 [20] 黄立弗. 苏共政治控制衰变探析[J]. 东欧中亚研究, 2000, (2).
- [21] 陆南泉, 等. 苏联兴亡史论[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2.
- [22] 张宏毅. 要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J]. 高校理论战线, 2001, (1).
- [23] 戈尔巴乔夫. 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造[N]. 真理报, 1989-11-26.
- [24] 郭春生. 社会政治阶层与苏联剧变[M]. 北京: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6.
- [25] 克里斯托弗·安德鲁, 瓦西里·米特罗欣. 克格勃绝密档案: 下册[M]. 王振西译. 北京: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2.
- [26] (美) 杰克·F·马特洛克. 苏联解体亲历记[M]. 吴乃华等译.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6.
- [27] 刘金质. 冷战史[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

The Western Reason for the Failure of Gorbachev's Reform

ZHENG Yi-ping, NIE Sheng-pi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Nanjing, Jiangsu 210016, China)

Abstract: The Soviet Communist Party's loss of ruling status and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showed the failure of Gorbachev's reform. The reason for this failure has not only profound internal factors, but also inevitable external causes. The author thinks that long-term fight between US-led western countries and the Soviet Union is the external factor for the failure of Gorbachev's reform in that, firstly, the long-term fight between the western countries and the Soviet Union shook the belief of the Soviet people so that the legitimacy of the Soviet Communist Party was weakened; secondly, the Soviet leaders, intellectuals and the public were deeply affected by western values, and thus they gradually gave up socialism; thirdly, greatly influenced by western countries, drastic changes happened in Eastern Europe and Soviet ethnic separatist movements took place, all of which forced the Soviet Communist Party to give up the principle of one-party system; fourthly, supported by western countries, the Soviet radical reformist restricted Gorbachev which finally led to "8·19 Coup"; lastly, economic help from western countries was not strong enough, and Gorbachev's economic reform failed.

Key words: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the failure of Gorbachev's reform; external causes; the western reason

[责任编辑: 凌兴珍]